



李贽 儒學

思想研究

◎ 王寶峰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李贽 傳 學

思想研究

◎ 王寶峰 著

责任编辑:赵圣涛
封面设计:徐 晖
责任校对:张杰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贽儒学思想研究/王宝峰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1
ISBN 978 - 7 - 01 - 011277 - 0

I. ①李… II. ①王… III. ①李贽(1527~1602)-儒学-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248. 9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33074 号

李贽儒学思想研究

LIZHI RUXUE SIXIANG YANJIU

王宝峰 著

人 人 大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龙之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1 25

字数:350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 - 7 - 01 - 011277 - 0 定价:4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目 录

导论:李贽思想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1
一、明清时期	2
二、民国时期	5
三、新中国成立以后至“文化大革命”时期	9
四、20世纪70—90年代	15
五、20世纪末至今	22
六、台湾学者李贽思想研究概况	31
七、李贽思想研究展望	35
第一章 李贽生活的社会背景	41
一、朱明的家法	41
二、白银“密窖”	45
三、泉南佛国与海滨邹鲁	47
四、蔡清:从祀孔庙的李贽乡党	52
五、宗族:儒教社会之土壤	54
六、林载贽的庭训	60
第二章 学校以及科举生涯	63
一、程朱理学的科举化	63
二、科举必由学校:儒教的场所	66
三、明代科举考试:甲榜与乙榜	68
四、八股:从明经义到缮写誊录生	70
五、场上之文与场下之文	73

第三章 入道之门：从王学开始	76
一、生命的困顿：从辉县教谕到两京国子监	76
二、潜心道妙：道之饥渴与师友劝掖	80
三、狂者的担当：对深造自得之学的呼唤	83
四、良知：生命困境激发之领悟	86
五、良知与致良知	87
六、由私学到圣学：王学的影响	93
第四章 求道师友：李贽的学术渊源	95
一、留都讲会	95
二、求道于胜己之友	96
三、李贽与焦竑	99
四、李贽与耿定理、王襞	101
五、李贽与“二溪”	104
六、龙溪传人	111
第五章 牧民与参禅：治平事业之践履	114
一、姚安牧民	116
二、教化：儒教与异教之间	121
三、佛都探藏：对性命下落的窥测	125
第六章 安身立命与儒道儒教之辩	130
一、客寓求道	130
二、生死情切的时风	131
三、李贽为己之学	133
四、正统与异端：耿李论战	138
第七章 礼教视野下李贽妇女思想	169
一、《六经》女性观	169
二、《列女传》、《女戒》：节烈与妇道	181
三、缠足与旌表	189
四、生死理欲之间：宋明理学中的女性问题	194
五、李贽妇女思想、言行与风教	198
六、女教本义	217

第八章 李贽儒学思想:以经史为核心	219
一、自适,还是治世:李贽史学思想之意义和命运	220
二、《四书》论说	237
三、《易》因	266
四、礼乐论	274
五、尊孔与反孔:对李贽儒学思想的总体认识	285
六、尾声:另一只眼看儒教	299
结论:还原性诠释法与儒教社会	305
一、还原性诠释法写法说明	305
二、儒教社会:以李贽为向导	311
参考资料	315
后 记	333

导论：李贽思想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李贽（号卓吾，1527—1602 年）生活于嘉靖、隆庆、万历年间，生前就是一位颇具影响而又备受争议的人物。终明清两朝，正统异端之辩中的李贽，时而是圣人，时而是人妖，在判若云泥的毁誉声中沉浮。五四已降至今，由于时代问题更迭、研究方法各异，在不同历史时期，国内李贽思想研究呈现出了不同的时代特征和内容。1615 年，《利玛窦中国札记》在西方出版，作为“中国人中罕见的典例”，李贽被介绍到了国外。此后，日本、美国、德国、瑞士、新加坡等国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了李贽思想。由于知识背景、问题意识等不同，国外学者往往能展现出李贽思想之不同侧面。

本导论以历史进程为序，从时代背景出发，以思想史研究角度切入，国内为主国外为辅，述评明清至今有关李贽思想研究既有学术成果。其中，尤为关注近年来最新进展和此前综述所不言及者^①，并进一步探寻今后李贽思想研

① 本书之前，白秀芳、林海权、左东岭、许建平、张建业、李超、许苏民、佐藤炼太郎等人，先后从不同角度写有李贽研究的综述性文章。其中，白秀芳等在搜集近百年中外李贽研究资料基础上，写作了《近百年李贽研究论文著作目录索引》（白秀芳等：《近百年李贽研究论文著作目录索引》，见张建业主编：《李贽全集注》第 26 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357—411 页）、《近百年李贽研究综述》（《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 年第 6 期）和《李贽研究在国外》（《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 年第 1 期），对五四至今中外李贽研究成果进行了全景式的介绍。此外，张建业《李贽研究的拓展与今后研究的思考》（张建业：《李贽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13—219 页）对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李贽研究进行了简要回顾，并对今后李贽研究提出了四点建设性意见；左东岭《李贽文学思想与心学关系及其影响研究综述》（《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 年第 6 期）对 20 世纪以来心学与李贽文学思想关系研究进行了梳理；在《李贽年谱考略》“余记”中，林海权梳理了自 1603 年至 2004 年李贽研究大事记（林海权：《李贽年谱考略》，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65—497 页）；许建平《李贽思想演变史》“导语”（许建平：《李贽思想演变史》，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7—8 页）简略统计了 20

究之途径。

一、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制度化儒教社会经历了从烂熟走向解体的过程。由于礼教、科举等制度化保障,中西对抗之前,思想界之主流正统仍然是程朱理学。然而,随着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等环境因素变化,16世纪后半期至17世纪初之中国,出现了以阳明学及其后学为代表的“王学思潮”,思想界创造性研究气氛活跃,“可以和战国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比美”。^①此时,李贽继承了王学以及禅宗中的“异端”思想因素,通过痛斥僵化礼教和假道学,提出了一系列社会批判思想,期望探索出解决当时社会弊端的治平之道。但是,由于李贽思想异端特色太过突出,加之个性倔犟大胆、行为偏离“正道”、与耿定向之论争得罪权贵等原因,使其成为备受争议的人物。贯穿明清两朝,围绕李贽著述及其行径等方面展开的正统异端之辩,始终是评价李贽思想的主要脉络。

于李贽著述学问,正统派认为,李贽《藏书》、《焚书》等著作“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以吕不韦、李园为智谋,以李斯为才力,以冯道为吏隐,以卓文君为

世纪以来中外李贽研究成果;李超简介了五四运动至今中外李贽研究成果(李超:《百年李贽研究回顾》,http://www.qzwb.com/qzx/content/2006—08/16/content_2164016.html 访问时间:2011年3月2日);许苏民《李贽评传》第九章第二节《李贽思想的历史命运》展现了自明清至张建业《李贽评传》(1981年版)为止国内李贽研究情况,第三节“李贽思想的国际影响”对欧美以及日本李贽研究进行了简介(许苏民:《李贽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35—661页)。在国外,陈学霖(Hok-lam Chan)著有《当代中国史学中的李贽(1527—1602年):李贽著述及其生平新释》(Hok-lam Chan, *Liu Chih 1527—1602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iography: new light on his life and works*, White Plains, N. Y. : M. E. Sharpe, Inc., 1980.),在考察20世纪70年代中国国内李贽研究基础上,该书全面介绍了李贽生平资料及著作存佚真伪等问题。此外,林昌如:《李卓吾名闻新加坡》、李甦平:《李贽思想对日本的影响》、日本学者疋田启佑:《李贽研究在日本》(见张建业主编:《李贽学术国际研讨会论文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82—290、291—299、336—341页)、佐藤炼太郎:《李卓吾研究的历史》(上、下)(日文)(佐藤炼太郎:《阳明学》第12、13号,2001年),分别对日本、新加坡李贽研究情况进行了回顾和总结。白秀芳、李超、许苏民等人的综述,对明清时期学者,以及中国台湾学者对李贽思想的研究,或没有涉及,或失之于简略;对岛田虔次、沟口雄三、狄百瑞等人李贽研究,或语焉不详,或没有提及;而对姜进等学者新近研究进展,则完全略过。因此,对全面掌握李贽思想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是不够全面充分的。

^① 侯外庐:《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

善择佳偶，以司马光论桑弘羊欺武帝为可笑，以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狂诞悖戾，未易枚举，大都刺谬不经，不可不毁者也。”^①四库馆臣痛斥“贽书皆狂悖乖谬，非圣无法”，《藏书》“排击孔子，别立褒贬，凡千古相传之善恶，无不颠倒易位，尤为罪不容诛。其书可毁，其名亦不足以污简牍。”^②持此论调者，如周应宾、蒋以化、方以智、谈迁、王宏、顾炎武、王夫之等。他们指斥李贽为名教之罪人，其说为诬民之邪说，得罪名教，流毒后学。学者哀叹：“李卓吾大抵是人之非，非人之是，又以成败为是非而已，学术到此，真成涂炭，唯有仰屋窃叹而已，如何如何”。^③

辩诬者针锋相对，指出《焚书》、《藏书》之作，“其意大抵在于黜虚文，求实用；舍皮毛，见神骨；去浮理，揣人情。即矫枉之过，不无偏有重轻，而舍其批驳譏笑之语，细心读之，其破的中窍之处，大有补于世道人心。而人遂以为得罪于名教，比之毁圣叛道，则已过矣。”^④又或曰：“夫评史与论学不同，《藏书》品论人物，不过一史断耳，即有偏僻，何妨折中。乃指以为异为邪，如此则尚论古人者，只当寻行数墨，终身唯残唾是咽，不敢更置一喙耶。”^⑤

李贽贻人口实的，还有其行迹乖违世俗。这一点，更为卫道者所不齿和痛恨：“尤可恨者，寄居麻城，肆行不简，与无良辈游于庵，拉妓女，白昼同浴，勾引士人妻女人庵讲法，至有携衾枕而宿庵观者，一境如狂。又作《观音问》一书，所谓观音者，皆士人妻女也。而后生小子喜其猖狂放肆，相率煽惑。至于明劫人财，强搂人妇，同于禽兽而不足恤。迩来缙绅士大夫亦有捧咒念佛，奉僧膜拜，手持数珠，以为律戒；室悬妙像，以为皈依，不知遵孔子家法，而溺意于禅教沙门者，往往出矣。”^⑥顾炎武道：“自古以来，小人之无忌惮而敢于叛圣人

^① 《明实录·神宗实录》卷369,《明实录》第59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第6917—6918页。

^②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上),中华书局版1997年版,第702页。

^③ 厦门大学历史系编:《李贽研究参考资料》第二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63页。

^④ 《焚书》,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5页。(中华书局本书名为《焚书 续焚书》,其中,《焚书》、《续焚书》分别计页;本书区别《焚书 续焚书》为《焚书》、《续焚书》,并标示各自页码。)

^⑤ 厦门大学历史系编:《李贽研究参考资料》第一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2页。

^⑥ 《明实录·神宗实录》卷369,《明实录》第59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第6918页。

者，莫甚于李贽。”^①在张问达等人眼中，李贽勾引良家女子、败坏后生小子、侵蚀士大夫风气，其伤风败俗之行迹，实在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与批判者论调截然相反，激赏者竭力为李贽辩诬。焦竑“推尊卓吾，无所不至”，认为李贽“高迈肃洁，如泰华崇严，不可昵近，听其言泠泠然，尘土俱尽”，^②“即未必是圣人，可肩一狂字，坐圣门第二席”。^③马经伦曰：“李先生，所谓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之人也”，“夫其不知于世人也，是先生所以超出于千万劫之世人者也；其不知于道人也，是先生所以超出于千万劫之道人者也”。^④ 反驳李贽宣淫勾引之说，曰：“夫以七八十岁垂尽之人，加以淫纵勾引之行，不亦可笑之甚乎？”^⑤“宦游二十余年，一介不取，清标苦节，人所难堪，海内荐绅，谁不慕说？夫以如是人品，如是操履，而以逾闲荡检之事诬之，亦大不伦矣。”又反诘道，李贽“有官弃官，有家弃家，有发弃发，盖其天性孤峻，直行己志，老来任便，有何不可？”^⑥事实上，李贽之所以得罪当道，被人诬蔑，还有现实人事纠葛的原因。钱谦益道出了其中原委：“卓吾所著书，于上下数千年之间，别出手眼，而其掊击道学，抉摘情伪，与耿天台往复书，累累万言，胥天下之为伪学者，莫不胆张心动，恶其害己，于是咸以为妖为幻，噪而逐之。”^⑦

陈清辉指出，“李卓吾一生正处新旧思想交替之转折期，故其所受评价毁誉参半，尊之者视之为圣人，毁之者目之为异端小人，两者差距，判若云泥。大抵思想前进者，激赏之；囿于传统者，斥责之；当道者，厌恶之；在野者，崇信之。”^⑧实际上，毁誉之间的李贽，一方面，被个人生命困苦所激发，汲汲于寻求性命之道的下落；另一方面，又抱定治国平天下志向，以孤臣孽子心情，终生追求救治社会弊端之道。李贽的探寻和心情，颇能得到有良知学者的同情和支持。但是，由于他站在体制之外的社会批判，在当道看来是“敢倡乱道，惑世诬民”（明神宗语）。其激越的思想，已经超过了名教所能容忍的边界且影响

① 《日知录集释（全校本）》（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070页。

② 《焦序》，《藏书》第一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③ 朱国桢：《涌幢小品》（上），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69页。

④ 厦门大学历史系编：《李贽研究参考资料》第一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8页。

⑤ 厦门大学历史系编：《李贽研究参考资料》第一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2页。

⑥ 厦门大学历史系编：《李贽研究参考资料》第一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4页。

⑦ 厦门大学历史系编：《李贽研究参考资料》第一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4页。

⑧ 陈清辉：《李卓吾生平及其思想研究》，文津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

颇大，直接威胁着整个儒教社会思想基础。加之，李贽桀骜不驯之个性、得罪地方权贵所招致的祸尤等原因，致使其不见容于当道、见逐于抱定儒教正统观念之道学家。李贽最终自刎诏狱的悲剧，自有其不可避免之必然性在。

早在明清时，李贽便被介绍到了西方和日本。1615年《利玛窦中国札记》在西方出版。书中，李贽被描述为“在官场中是位有名的交际家，又是一位老成持重的幕僚”，是宁死不肯受辱的“中国人中罕见的典例”。^①这是西方世界认识李贽的开始。在日本，明治维新先驱吉田松阴熟读《焚书》、《藏书》，作《李氏焚书抄》、《李氏续藏书抄》。他称李贽是“一世之奇男子”，自称神会于李贽学说，尤其服膺童心之真。又发明李贽生死观为“道尽心安，便是死所”，并以此勉励同道。^②作为“孤军的知己”（沟口雄三语），李贽思想激励了日本明治维新先进分子，一定意义上成为他们的精神寄托、动力所在。^③吉田松阴之后，1893年，日本人陆羯南发表了《李卓吾评传》，是最早有关李贽的论文；此时，今关天彭又写有《李卓吾先生》（1909年）一文。^④

二、民国时期

近代以来，中西文化对抗，西化思潮涌起。在启蒙与救亡并举的时代背景下，从五四至1949年，出现了李贽思想研究的第一次高潮。此时，对应于西化思潮，以引进现代西方学术和文化为目的，学者自觉地运用现代西方学术理论，力图阐发出李贽思想中离经叛道的因素，借以批判传统儒教社会，清理“封建遗毒”，为西方思想文化的传入扫清道路。此时李贽研究代表人物有吴虞、嵇文甫、朱维之、容肇祖、萧公权、吴泽等人。他们的李贽研究，实际上扮演了思想“清道夫”（胡适语）的角色。在国外，此时有德国人福兰

^① [意]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86、388页。

^② 厦门大学历史系编：《李贽研究参考资料》第二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20—221页。

^③ 李甦平从生死观、宇宙观、交友观三个方面，讨论了李贽思想对吉田松阴的影响。（张建业主编：《李贽学术国际研讨会论文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91—299页）。

^④ 张建业主编：《李贽学术国际研讨会论文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36—341页。

格,日本人铃木虎雄、小岛祐马、岛田虔次等人,从不同角度阐释了李贽思想。

吴虞《明李卓吾别传》,以西方现代生活观念和法政思想为背景,通过评价历来对李贽的正反意见,对孔教进行了猛烈的抨击;^①嵇文甫称李贽“爱好自由、冲抉世纲”之思想和行动,“最可以表现左派王学的特色。”^②又说,晚明似儒非儒似禅非禅的“狂禅”运动,到李贽“算是发展到极端了”;^③容肇祖指出,“李贽的思想,是从王守仁一派解放的革命的思想而来,他几乎把一切古圣贤的思想或偶像打破了,到了极自由,极平等,极解放的路上,而他又是个自然主义,适性主义的思想家,在批评方面,贡献了不少创新的独特的见解。”^④萧公权说,李贽“生当专治势力方张,欧洲文化尚未大量输入之时”,其基于个人自由观念,“排孔孟,疑六经,倾道统而专以心得为是非之准”,“为此石破天惊之议论,其事尤为难能,宜乎国人皆曰可杀,而卒以身殉也”;^⑤吴泽《儒教叛徒李卓吾》,意在“严格批判孔孟儒学名教,彻底打断恶劣的封建旧传统”,“为民主革命的思想清道”。^⑥他认为,“卓吾站在求个性自由解放立场上,考察问题,认识问题,措理问题,和传统的封建名教的专制独断主义相拮抗!根本上,卓吾的自由解放思想,就是在封建儒教的专制独断压迫下,激发出来的反抗思想!”^⑦又说,李贽“大胆狂悖的批判,反孔孟,反名教,也仅仅是反孔孟反名教的专制独断而已,对于封建制度,这个贵族统治的社会,他不但不反对,而且是拥护的!”^⑧吴泽还说:“卓吾虽是儒圣,确同时尊重佛道,倡‘三教同道’,‘三

① 吴虞:《吴虞文录》卷下,《民国丛书》第二编第96册,亚东图书馆1927年版,第20—51页。又见厦门大学历史系编:《李贽研究参考资料》第一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8—53页。

② 嵇文甫:《左派王学》,《民国丛书》第二编第7册,开明书店1934年版,第81页。

③ 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论》,《民国丛书》第二编第7册,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第38页;又见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58页。

④ 容肇祖:《李卓吾评传》,《民国丛书》第一编第83册,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99—100页。

⑤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萧公权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85页。

⑥ 吴泽:《儒教叛徒李卓吾》,华夏书店1949年版,第3—4页。

⑦ 吴泽:《儒教叛徒李卓吾》,华夏书店1949年版,第151页。

⑧ 吴泽:《儒教叛徒李卓吾》,华夏书店1949年版,第110页。

教并重’论，这是谈道者的真精神。”^①此时的思想界，虽有如林琴南等卫道士出于正统礼教观念而痛批李贽，却被时代潮流所裹挟，早已淹没在西化先进分子对李贽的一片赞誉声中了。

20世纪30年代末，德国人福兰格(Otto Franke)在柏林发表了《李贽》(1938年)和《李贽与利玛窦》(1939年)两篇论文。作者认为，作为一个战士，李贽是王学极端化的代表人物。其“消极议论”最初攻击朱熹信条，进而还攻击“儒家一般”。又指出，西方思想家“把儒家的中国看做理性宗教的理论的实现，纯美道德的国土，在这国家里哲学家具有国王的地位。他们却不能感到，他们面前是一个僵死的精神世界，这世界的沦亡已经临头了”。作者还介绍了李贽和利玛窦的交往，并证明李贽与当时中国的反基督教运动无关。^②福兰格还认为，李贽等王学极端之徒，“不慑于维护正统者之淫威而钳口，且放力行其所是，端视贞毅，不重颖达”，是“能为思想人格之自由作殊死战者”。他们的最终目的，“在脱出传统儒教之藩篱，而融合真纯之孔、释、老三者之教义为一也。”^③

在日本，此时有广瀬丰《续吉田松阴研究》(1933年)、铃木虎雄《李卓吾年谱》(1934年)、小柳司气太《利玛窦与明末思想界》(1938年)、小岛祐马《李卓吾和六经皆史》(1947年)等论著问世，分别探讨了李贽生平事迹、思想及其影响。^④1949年，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出版，该书第十一章“明代的史学”专节介绍了“李贽的史论”。内藤认为，作为万历时著名的阳明学者，李贽思想“以禅学为基础，而加以儒学的产物，因此即便对孔子也有苛刻轻蔑的评语”。《藏书》“序文、目录、编纂体例都是有其本人主张的，实为极端之作”，“乃旷古未有之过激思想史论”。^⑤同年，岛田虔次《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一

^① 吴泽：《儒教叛徒李卓吾》，华夏书店1949年版，第154页。

^② 厦门大学历史系编：《李贽研究参考资料》第二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27—229页。

^③ 厦门大学历史系编：《李贽研究参考资料》第二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22—226页。

^④ 张建业主编：《李贽学术国际研讨会论文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36—337页。张建业主编：《李贽全集注》第26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395页。

^⑤ [日]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马彪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15—219页。

书的出版,成为日本乃至世界李贽思想研究重要代表作之一。^① 该书通过追溯“王学左派”从王阳明、泰州学派,最后发展到李贽的思想历程,试图“跟踪作为心学的核心——人的概念的形成与发展,通过回顾构想这样的人的概念的心学者们的实践,去探寻心学运动之历史的、社会的意义,将其所遭遇的命运的必然性和近代中国本身的构造联系起来进行理解”。^② 通过这样的梳理,岛田得出结论:具有“理性精神”、“自我肯定”、“庶民意识”等的“近代精神”、“近代思维”在“王学左派”思想进程中得到了“培育”和“展现”。但是,由于统治者政治文化的高压政策,这一“近代思维”的历史进程最终受到了意外的“挫折”。^③

具体到李贽研究,岛田认为,李贽受难是因为《藏书》,该书颠倒了万世之是非,对文化和传统进行了严格的合理主义的批判和逆转。李贽批判的总根据,是童心的“吾”。作为王阳明良知说的“成年”和“独立”,童心说有着不同于良知说的近代特点:一方面,具有童心的“吾”,不因道理闻见而改变对童心权威的信任这一点,童心说继承了良知说;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作为良知的成熟和近世精神的成年之童心,由于确信自己优越的缘故,所以作为它的成熟的必然结果,就要求向‘外’的活动”。^④ “绝假纯真”的童心,由于不拘泥于偏见的判断性自我,内在地包含了财、势、利等现实的欲望,其对人欲的肯定,是始终忠实的、彻底合理的。根据童心的权威,热衷于读书闻见的李贽,向

^① [日]岛田虔次:《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甘万萍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该书最早由日本筑摩书店1949年3月初版。岛田虔次另一部名著《朱子学与阳明学》(1967年初版)([日]岛田虔次:《朱子学与阳明学》,蒋国保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旨在探索朱子学和阳明学的关系问题。此书第四章“儒教的叛逆者·李贽(李卓吾)”,即岛田虔次1962年发表于日本《思想》462号的论文《儒教的叛逆者李贽(李卓吾)》。该文分思想史的背景、生涯、童心说、历史批判和佛教及其他五个部分,认为“李卓吾的根本思想以二言概括之,即‘童心’”,是儒教完全展开到其极限的代表。王学左派之狂,导致与当时“民变”一致的思想“暴动”,李贽即此时思想上的“暴徒”。(又见[日]岛田虔次:《中国思想史研究》,邓红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35—149页。)

^② [日]岛田虔次:《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甘万萍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③ 参见吴震:《16世纪中国儒学思想的近代意涵——以日本学者岛田虔次、沟口雄三的相关讨论为中心》,载《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第1卷第2期。

^④ [日]岛田虔次:《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甘万萍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3页。

“外”大胆地评论了古今的人物、政治、文艺、学术。岛田认为，李贽之前心学是自我辩护的。作为心学思想逻辑终点，童心说在深化心学思想本身的同时，更把心学作为社会实在来把握。童心说使得心学不只是“内”的要求的主观固执独断，而是“内”对“外”获得了客观的认识，达到了对于“外”以自信去较量克服的地步。良知说从本质的人、纯粹的人出发，到了童心说，已经达到了对政治文化客观的认识。在这里，伦理从政治中、历史从伦理中基本上被一一区别开来，特别是文学也被承认是有其独自的原理和领域。西欧的近代精神和原理，似乎已在此显现。因此，岛田得出结论：童心说是心学的逻辑终点，也是中国近代思维的一个顶点。^① 岛田认为，正如李贽的遭遇一样，中国近代思维由于过早出现的缘故，最终难逃挫折的命运。李贽狱死，“正是中国近世最终没有形成市民性近代社会之命运的一个确切的象征”。^②

三、新中国成立以后至“文化大革命”时期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至“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大陆的李贽研究，以朱谦之、侯外庐、邱汉生、任继愈、杨荣国等人为代表。^③ “文化大革命”前，学者普遍用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李贽思想。受时代环境影响，此时李贽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具有政治色彩的研究倾向。^④ “文化大革命”期间，受“批林批孔”、评法批儒政治运动的推动，李贽作为法家重要代表人物受到格外重视。总体而言，此时李贽研究，除了搜集整理了一些原始资料之外，已基本上越出了学术研究范围，成为服务于政治运动的工具。同

^① [日]岛田虔次：《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甘万萍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9—112页。

^② [日]岛田虔次：《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甘万萍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2页。

^③ 1975年，福建省李贽著作注释组福州小组完成了《二十五年来书刊评介李贽观点综述》。该册分：“一、批林批孔以来的主要观点”；“二、‘文化大革命’前的主要观点”；“附：《儒教叛徒李卓吾》一书部分观点摘要”等三个部分，介绍了自吴泽《儒教叛徒李卓吾》至1974年期间（主要是1956年至1974年），国内李贽研究的主要论文、著作。

^④ 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冯友兰运用毛泽东《矛盾论》观点解释李贽思想的文章《从李贽说起——中国哲学史中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互相转化的一个例证》。（《新建设》1961年第二、三期合刊；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2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52—566页）。

期,国外狄百瑞、沟口雄三分别从个人主义和前近代“思想人”角度切入,深入解析了李贽思想。

朱谦之认为,李贽思想反映了小地主和市民的思想。其哲学思想是一种企图调和唯心论和唯物论的二元论,既有局限性的一面,也有积极进步的一面。“总的来说,李贽的思想是自由的、平等的、有革命性的。他的思想解放运动,在中国近代哲学上是一个新的斗争开始”;①侯外庐、邱汉生指出,中国封建社会的资本主义萌芽,导致了李贽思想处在新旧思想交织的矛盾之中,但在基本的倾向方面,李贽还是以反封建的战术思想为“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因此,其思想是“顺着健康的途径发展”的。作者认为,以“异端”自居的李贽,其思想“无可怀疑地具有鲜明的反封建的革命性格”。②李贽的思想,充满了平等、自由和尊重个性的精神。因此具有反对封建等级、特权的战斗意义。但是,这种思想还没有完全达到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则或人类学的原则。李贽理论体系的积极方面是批判历史现实和社会现实的战斗精神,消极方面是受禅学的影响。在离开人伦日用自然的俗界,幻想“彼岸”以求心理上的超脱或解放时,便堕入了禅学的唯心主义。③侯外庐又将李贽列为中国启蒙思想家之一,直接开启了之后从启蒙思想家角度研究李贽思想的先河;④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第三册第六篇第十四章为“李贽的进步的社会观和唯心主义哲学思想”,此章论述道,李贽虽然基本上接受王守仁的良知说,但不是简单的继承,而是对封建社会道德的虚伪性提出了极为尖锐的批判,“在某些方面远远超出了王守仁的正统观念所能允许的范围,起了背叛的作用”。⑤但是,在激烈的批判之后,李贽并没有提出一套新的标准与封建正统标准相抗衡。“这主要原因是当时还没有出现新的生产关系,在不触动旧的生产关系

① 朱谦之:《李贽——十六世纪中国反封建思想的先驱者》,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3页。

② 侯外庐、邱汉生:《李贽的进步思想》,载《历史研究》1959年第7期;另见: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下),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054—1060页。此外,邱汉生还著有《李贽》一书(邱汉生:《李贽》,中华书局1962年版),简述了“泰州学派有名的学者”李贽“战斗的一生”及其“反道学的思想”。

③ 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下),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061—1095页。

④ 侯外庐:《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5—91页;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⑤ 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第三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73页。

的前提下,任何对旧思想的冲击,都不免以失败而告终”。^①“从李贽的错误中,可以给我们提供哲学史上的思维经验教训:用一种唯心主义去反驳另一种唯心主义,并不能给对方以真正的杀伤;用怀疑主义、相对主义去反对封建偶像,也不能真正把偶像打倒”。^②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批林批孔”运动,宣扬了儒法斗争是中国哲学史发展主线的论点。^③这种论点认为,“尊法反儒”代表着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是革命阶级和进步思想家反对复古倒退的思想武器;“尊儒反法”则是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思想的表现,代表着反动、黑暗和退步的政治势力的利益。此时,在“评法批儒”政治热浪冲击之下,李贽作为法家代表人物,受到格外重视。全民参与之下,报刊、书店一时充斥着与李贽相关的文章、著作。^④然而,除了整理李贽研究材料等尚有学术价值之外,基本上沦为了政治斗争的工具。^⑤

纵观这一时期中国大陆李贽思想研究,“文化大革命”前,学者继承了五四以来表彰李贽的传统,普遍采用了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的研究方法。研究者往往按照唯物唯心、进步落后等标准评析李贽思想得失。这种诠释,现实关照十分明显,尤其凸显了李贽思想中异端的、战斗的、反封建的因素。这种研究途径,初期尚能从学术角度进行客观探讨,进而成为唯一研究方法,最终演化为“文化大革命”时“评法批儒”政治斗争的工具。其演变历程,颇引人深思。此时李贽思想研究,陷入了表面繁荣下的历史困境。

1970年,美国人狄百瑞(Wm. Theodore de Bary)发表其长篇论文《晚明思

^① 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第三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73页。

^② 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第三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87页。

^③ 以儒法斗争为主线编写的《中国哲学史》,以杨荣国的《简明中国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为代表。

^④ 白秀芳:《近百年李贽研究论文、专著目录索引》,见张建业主编:《李贽学术国际研讨会论文集》附录三,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50—358页。白秀芳等:《近百年李贽研究论文、著作目录索引》,见张建业主编:《李贽全集注》第26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390—391页。

^⑤ 《李贽思想评介(资料选辑)》(福建省晋江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李贽思想评介(资料选辑)》,1975年)中,有关于李贽家世、故居、墓葬、画像、书法等原始资料;厦门大学历史系编辑《李贽研究资料》(第一、二、三辑)(厦门大学历史系编:《李贽研究参考资料》第一、二、三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75、1976、1976年版),原文照录历来中外有关李贽的原始研究资料,至今仍是李贽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